

重点关注

当传统艺术成为小说的新密码

□李红强

小说从来都有自身的主体。这主体是人，是人或人的心象与世间物象的隐秘纠缠。但小说从未抵达自足圆满的境界，它始终保有向外求索的视野与不竭的审美好奇。一部小说史，本质就是不断寻找、重塑自身叙事的历程。

近年来的文艺出版，艺术成为小说本体，或者艺术正以广袤的原野向小说开放。往常门槛高、小众化的艺术，不再仅仅是小众读者的消遣，甚至逐渐站到大众视野的中央。文化革新的先锋往往先在大众市场中生长：游戏《黑神话：悟空》以美术造境震动全网，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对传统神话的少年性叙事创造票房奇迹，“数字敦煌”在撩开千年洞窟神秘面纱的同时激起创作者的热情，甚至一册售价3.5元的文学连环画《你管不着》依托图像叙事延伸至文创、动漫产业链，实现百万级的市场收益……本土线描、水墨叙事正在重新俘获青年群体，古画、器物、传统手工艺、东方审美接连破圈。这些并非转瞬即逝的流量潮流，而是全民审美结构迭代的信号。敏锐的作家自然不会放过，小说叙事恐怕正迎来一次以传统艺术为本体的创新转型。

这一转向来自生活的土壤。土壤有多层，首先是整个社会审美底色在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当物质生活丰盈、移动媒体信息过载，那些严肃的故事无论再跌宕起伏，也已经无法改变老读者或新青年的审美倦怠。反倒是生活的原味在阅读中达到的肌肤之感，或者如《给阿娜的情书》给情感装上至柔至美的滤镜，或者如宋代绘画的留白所具有的悠远、素净、简约的意境，正成为大众普遍认可的审美标准。这是时代变革为我们身处的社会带来的美学进步，更是全民文化修养提升后带来的新期许。

毫无疑问，互联网技术和“第二个结合”带来的思想解放，为这场美学变革注入了核心动能。可以看到的是，这一切还只是开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美学力量在此之后将彻底释放。其实，我们已经强烈地



《庆余年》，猫腻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2023年

感受到其释放的能量，无论是世界消费市场对中国网络文学全球订购，还是网上国外网友“成为中国人”的热闹，源自民间的造像艺术、笔墨丹青中蕴藏的东方智慧，尽显另一种文化形态的魅力。也许是网络小说超长的篇幅使然，网络作家普遍惯于在作品中构建一个独立的“世界”——这是一种“双重”世界观，既无限庞杂地将真实世界中的物象融汇其中，又以艺术的完整性将万物串联起来。对这类作家而言，小说首先是美的、艺术的，构建审美意境、塑造艺术质感几乎成为他们的第一选择，中国古典绘画、民间艺术、考古等都会在想象中放大，由物象升华为作品的精神气质。如同在《庆余年》《雪中悍刀行》中，我们看到了诡诈趣味的角色性格，但文本真正的精神内核是水墨写意独有的空灵张力；正是

从来压倒柔情，丛林法则历来正统。而中国玄幻、奇幻网络文学异军突起，深受国外读者喜爱。中华文化中道家玄妙的内功、源自民间的造像艺术、笔墨丹青中蕴藏的东方智慧，尽显另一种文化形态的魅力。也许是网络小说超长的篇幅使然，网络作家普遍惯于在作品中构建一个独立的“世界”——这是一种“双重”世界观，既无限庞杂地将真实世界中的物象融汇其中，又以艺术的完整性将万物串联起来。对这类作家而言，小说首先是美的、艺术的，构建审美意境、塑造艺术质感几乎成为他们的第一选择，中国古典绘画、民间艺术、考古等都会在想象中放大，由物象升华为作品的精神气质。如同在《庆余年》《雪中悍刀行》中，我们看到了诡诈趣味的角色性格，但文本真正的精神内核是水墨写意独有的空灵张力；正是



《听漏》，刘醒龙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7月

这一写意美学，牵引着人物的命运走向，驱动了小说的叙事逻辑。传统艺术成为小说的起点和品格，在众多实力派作家中多有展现。邱华栋的长篇小说《敦煌变》大胆求变，让近些年“艺术成为小说本体”的写作走向新高度。刘醒龙的《蟠虺》《听漏》，深耕考古现场，以青铜重器、地下遗存为线索，把深埋土层的文物化作勾连古今的叙事纽带。葛亮则是温润的，《瓦猫》聚焦民间手工艺人的泥塑匠心，《燕食记》借烟火饮食、烹饪礼制铺展岭南的古典风貌。这些作品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艺术不再是小说的附属装饰，它完全有能力独立支撑叙事——时代赋予文学的新质不容忽视，“第二个结合”正为文学开辟一条新的美学道路。

（作者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

从创作方法层面梳理，乌琼的乡土散文形成一套适配地域研究的写作范式，兼具文学表现力与文本研究价值。其一，采用实地走访式纪实叙事，以采访经历串联素材，牧人、鄂温克老人、园长、农场工人的原生对话保留民间话语的真实性，避免脱离现实的主观抒情。其二，以本土风物构建意象体系，月亮承载乡愁团圆、沙柳代表生态修复、驯鹿象征森林文明、篝火代表民族信仰，所有意象均扎根本地现实，具备明确的现实指向。其三，叙事保持客观克制，面对沙化、狩猎文明消亡、母语流失等现实困境，不刻意渲染悲情，同步记录治沙成效、校园文化传承、线上牧业发展等正向实践，形成辩证完整的论述视角。其四，运用时空对照的叙事结构，以当下场景勾连过往记忆，今昔对比直观呈现数十年间自然环境、民族生活的变迁，强化文本的现实参照意义。

整体而言，乌琼的乡土散文突破普通地域游记的浅层写景模式，平等观照草原、森林、湿地与各类生灵，记录多民族传统生产、民俗、信仰，将呼伦贝尔定义为各族群众共同的精神原乡，无论牧民、山林使鹿人还是记录者自身，都在这片土地上寻找精神归属，始终传递着对地域文化与人文精神的守护意识。（作者系内蒙古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新时代文学研究的担当与气象

——评《在场与返场：当代文学的当下性与历史化研究》

□段玉亭

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如何穿梭于文学现场和历史语境之间，兼顾“当下性”和“历史化”，是其面临的重要命题。青年学者王仁宝在其新作《在场与返场：当代文学的当下性与历史化研究》（以下简称《在场与返场》）中，汇集10余年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在呈现个人学术理路的同时回应这一时代与历史议题。该论著不仅为我们呈现了当下文学的创作现象与特征，勾勒当代文学的历史轮廓与传承新变，而且兼具温度与深度，展现出新时代青年学人的赤诚本心与宏阔气象。

在该书后记中，作者坦陈自己与文学的渊源，从中可见其阅读与研究文学的初心。年少时爷爷奶奶讲述的农村往事，初入大学时乡土题材小说的文学启蒙，硕博期间导师影响形成的学术兴趣，工作后的个人成长等，共同呈现出作者与文学结缘并以此作为志业的历程。个人出身、阅读兴趣和良师引导，使得其对文学始终保有兴趣与热爱，并坚守“保持最初的感觉走进一个作品，走近一个作家”的阅读状态。该著作是作者10

余年阅读思考与日积月累的结果，绝非仅凭聪明勤奋、博闻强记所能实现，还有赖于他面对文学时纯粹的本心。诚如李贽在《童心说》所言：“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这种理想的阅读状态使得文学研究始终保有面对文本说话的能力。《在场与返场》以作品为立足点，在进行文本阐释时，兼具内敛与开放的特征，并擅长发现作品中的诗意。论著一面聚焦于文本内部世界，从人物、情节、环境、语言等要素探讨作品的创作倾向、哲理意蕴、叙事策略、艺术渊源等，在精琢细磨中挖掘作品独特的审美特征；一面将其他作家、作品、文体、理念等引入文本解读过程，在细读与对比中丰富作品的意蕴。在梳理陈忠实小说现实主义发展脉络，论析刘醒龙《听漏》的哲思现实主义风格，解读陈彦、徐则臣、喻之之等作家作品时，作者既专注文本，又注重不同文本间的互动与联系。在诗歌研究中，作者既注重探讨创作主体、主题、风格等特点，又着眼于意象、语言、情感、修辞等细节，展现作品诗画合一、声情并

茂的诗性特质。作者还将这种诗性解读延伸到小说研究中，如对十七年小说抒情特质的阐述，揭示作品诗性魅力的同时，也增强了文学研究自身的诗性品格。

立足文本细读之外，作者还将对文学真挚醇厚的情感投射到研究对象和前辈学者身上。在研究路遥传记、梳理洪子诚文学史写作特点、探讨学者于可训的文学创作、归纳李遇春文学批评理路时，他不因研究对象的成就地位而溢美，也不因其存在局限而讥消，在不卑不亢中客观、真实、贴切地呈现研究对象的个性特点与立体多面。这种以真诚和尊重为底色的人文关怀构成了《在场与返场》的内核，也外化于其研究形式中，最引人注目目的是对学者与前辈研究成果的援引。这本不足为奇，但在篇幅有限的正文中，如此不惜笔墨的引用，似是有意识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视野渗透进文学研究的日常。从传播与接受角度而言，这一形式既浓缩了学人研究成果，也方便了读者阅读，更避免将文学研究引入闭门造车之狭隘境地，是对作家、研究者、读者的多重考量，可见作

者的谦逊姿态与恭敬之心。

《在场与返场》以十七年小说研究为起点，关注其创作状貌的同时，注意到十七年文学作为一种“传统”对后来文学，尤其是新时代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由此描绘出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进而经由对不同时期作家、作品、学者的解读再现文学的发生与批评现场，在“史”的勾勒、“诗”与“实”的填充中，呈现鲜活可感的当代文学面貌。不仅如此，该论著还将当代文学置于中国与世界文学的历史场域中，观察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与当代文学发生、发展或隐或显的联系，引导我们在更为悠远的历史与宏阔的空间中审视当代文学。

经由“在”与“返”的路径，抵达囊括万象的文学“场”，从文学阅读“最初的感动”到研究中扎实的中外理论基础、宏大的社会历史视野、多学科交叉的批评方法，《在场与返场》展现了当代文学的当下性与历史化，也彰显出新时代文学研究的人文担当与高远气象。（作者系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

重建有诗有美的生活现场

——读刘福君诗歌作品《我乡下的祖国》

□王德光

诵的，不是我们惯常在教科书上感知的、作为历史叙事的祖国，而是一个可以触摸、可以呼吸的祖国——那是由“责任田”“自留地”“开花的果园”构成的生存根基，是由“妻子和小黑水罐似的儿子”所承载的血脉与日常。诗人告诉我们，对祖国的爱，或许首先应该是一种能弯下腰、能沾满泥土、能精确到“一垄韭菜、三棵梨树”的挚爱。

“我乡下的祖国”这一核心意象的生成，是诗人半生行走与沉思后精神世界自然凝练的琥珀。他生于燕山腹地的兴隆，长于草木与岩石之间，而后以诗与文行世，最终以惊人的行动力，倾

十余载心血，将自己的家乡诗上庄，从一个寂寂无名的山村建设成一座诗歌文化小镇。这一历程本身就是一首行动之诗。因此，在刘福君的诗行里，我们读到的不是知识分子式的田园乡愁，而是一个建设者、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当代人的体温与心跳。坑头的灯盏、场上的柴垛、门前的菜园、篱笆、马车、割谷的快镰，这些意象密集、质朴，带着日常的光泽与劳作的繁忙。诗人“用青草叫住牛羊”“用野花唤醒露水”，这些诗句已然超越纸上风景，成为人与万物古老而默契的交谈。祖国的形象沉甸甸的，是足下这片能“以米粒呼

吸、泥土作梦”的实在江山。

这种将宏大归附于具体、将抽象溶解于日常的书写，构成了诗人独特的诗学理念。他热爱“低处或高处的阳光”，也同样珍惜“阴影深处的血汗”。这是一种完整的、不回避的爱。于是，在这首诗的最后，出现了令人动容的包容与丰厚：“至于偶尔的歉收或一两张白条/我就笑着写进这首略带忧伤的诗篇”。这“笑”不是麻木，而是历经风雨后对生活本身的坦然与接纳；“略带忧伤”则是理解了一切不完美之后，依然深沉执着的眷恋。忧伤被诗篇承载、净化，最终升华为一种更为坚韧

对故乡的眷恋，可以说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诗人刘福君立足家乡河北承德兴隆诗上庄，在秉承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的基础上，不断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汲取营养，展现出一种精神自觉。其近日获得中国·柴桑第二届“陶渊明诗歌奖”的作品《我乡下的祖国》，历史意识与现实关怀并重，辅之以个人化内在诗性的发挥，梳理时代生活与血肉之躯的挚爱主题，最终回归对时代纵深的真切观照。

家园，不仅是刘福君诗歌之树根植的沃土，更是诗人精神力量的策源地。对他而言，地图的缩放，往往意味着视野的扩大。他在微观收缩的社会空间摆脱平庸庸碌的书写，在诗中淬炼出一种飞升感与深沉的爱。诗作开篇便完成一次诗意认知：“只有在本县地图上才能找到你/你是家乡，我乡下的祖国。”祖国这个宏大的词汇被小心翼翼地、充满虔诚地安放于“乡下”，安放于一个“在本县地图上才能找到”的精确坐标，一种崭新的、充满生命力的认知图景悄然展开。诗人所吟

的力量。诗人的爱，如同“一条河水贴着两岸的堤岸”，是依偎，是滋养，是沉默而坚定的存在。

在现代化、城市化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如何安放自己的精神故乡，又如何理解自己与脚下这片土地的关系？诗人将诗上庄从地理名词变为文化符号的过程，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生动回应。这是在大地上重建一个有诗、有美的生活现场，其诗歌便是这重建工程的蓝图与基石。当诗人在诗中一遍遍抚摸“田埂、石坝、土墙、守护的栅栏”时，他守护着一种即将消逝的、人与土地和谐相处的文明方式，一种“低处的”却至关重要的祖国形态。它启示我们，对祖国的深情，可以仰望星空，也可以俯身大地；可以波澜壮阔，也可以静水流深。那个在最小比例尺地图上可能被忽略的点，那个有着鸡鸣犬吠、乳燕呢喃的乡下，恰恰是祖国最真实、最坚韧、最富有生命力的部分。诗人以他半生的笔墨与行动，为我们守护并呈现了这样一个“乡下的祖国”——具体、温热，无比可爱。（作者系河北省承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乌琼乡土散文中的生态与文化意识

□艾平

乌琼长期扎根呼伦贝尔，创作了许多主题鲜明的散文作品。她的写作立足现场，将草原、森林等自然生态，与栖居于此的各民族生存现状相结合，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探讨生态存续、民族文化传承两大核心议题。此类散文可归入乡土散文，普遍具有细腻叙事质感，又依托地域形成较为清晰的思考脉络。

乌琼的乡土散文最基础的书写维度，是对呼伦贝尔自然空间的客观审美与诗意还原。她以个人在场的感官体验搭建自然叙事，以具象场景构建可供分析的自然美学体系。《草原望月》中两段观月经历构成对照：仲秋时节，巴彦塔拉苏木的月升极具视觉冲击力，“东边黑色的天幕上划出一条光亮的曲线，那是耀眼的橘色，比人间的灯火更为张扬……从未见过如此硕大的圆月，橙黄橙黄的，像火把外焰的颜色”。作者区分人造光源与自然月色的差异，城市灯火依靠人为设定，而月亮“盈亏盈亏，升起的时间有早有晚”，遵循自然节律，承载人的思念与团圆意象。另一幕呼伦湖满月，以湖水为载体，将天地生灵融为一体，平静的湖面托举圆月，人与月色默然相对，完成人与自然精神层面的相融。辉河湿地的候鸟、大兴安岭林间的白蝴蝶、额尔古纳成熟待收的麦田，共同构成完整的地域自然生态图景，为全文的生态反思铺垫了现实基础。

在自然审美之外，乌琼的乡土散文具备清晰的生态省思与修复的叙事逻辑，《呼伦贝尔，梦予绿色》是其生态观的集中体现。文章直面草原沙化的现实问题，将沙地比作“猛兽的利爪，从中心向外撕扯着草原”，数据与现场见闻结合，点明草原退化的严峻形势。但文章并未停留在问题层面，而是记录人为治沙的实践路径：牧民集体在沙地搭建草方格，混合燕麦、羊柴播撒草种，依靠植物根系固定流沙，逐步将流动沙地改造为稳定植被区。这套“破坏—溯源—治理”的叙事结构，跳出了单纯的写景抒情，形成完整的生态思辨：人类只有顺应自然规律、主动修复土地创伤，才能实现草场可持续发展。

《写给天空的诗行》以辉河湿地为对象，阐释万物共生的生态系统逻辑。湿地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苍鹭、天鹅、鸿雁等上百种水鸟提供繁殖栖息地，鸟类繁衍、捕食、迁徙形成稳定的自然循环；周边牧民放牧、通行，与水鸟长期共存，互不侵扰，呈现原生状态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范本。在乌琼的论述体系中，生态保护是土地、动植物、本地居民共同构成的整体性生存命题，人的观念与行为直接决定生态系统的存续状态。

多民族文化的存续、转型与传承，是乌琼乡土散文的另一个核心关切。呼伦贝尔境内分布蒙古族、鄂温克族等多个族群，现代化定居生活、市场经济持续冲击传统生产民俗，作者通过具体的事例、细节表现不同民族文化的演变路径，难得的是其间渗透着关怀与忧思。使鹿鄂温克人的文明转型，是其文本中极具研究价值的案例。《使鹿鄂温克人的节日》《密林深处有人家》呈现了鄂温克传统信仰体系：火祭象征家族兴衰，阿涅节需彻夜保留篝火，肉食必先敬献火神；人与驯鹿保持“使用但不占有”的共生关系，驯鹿是迁徙、生产、精神寄托的重要载体。同时，作者记录转型带来的文化阵痛：传统“乌力楞”家族公社解散，狩猎技艺逐步失传，而维加、纪录片创作者顾桃等人，以文学、美术、影像的方式留存森林记忆，成为文化自救的重要力量。这篇散文规避情绪化感伤，客观呈现文明转型的得失，探讨少数民族在现代生活中保留文化根脉的可行路径。

此外，乌琼的散文也记录了传统与现代融合发展的新型牧区生活。在《呼伦贝尔，冬日片段》中，牧民朝鲁门保留铲雪护蒙古包、烹制肚包肉、四季打草储肉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同时借助短视频、线上直播售卖草原特产，打造自有品牌，实现传统牧业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在《额尔古纳的麦子》一文中，额尔古纳农场的机械化麦田展现了农垦文化与草原文明交融共生的样貌，农垦劳动者顺应短促的无霜期抢抓收成，和牧民一同构成呼伦贝尔多元的生产主体。

从创作方法层面梳理，乌琼的乡土散文形成一套适配地域研究的写作范式，兼具文学表现力与文本研究价值。其一，采用实地走访式纪实叙事，以采访经历串联素材，牧人、鄂温克老人、园长、农场工人的原生对话保留民间话语的真实性，避免脱离现实的主观抒情。其二，以本土风物构建意象体系，月亮承载乡愁团圆、沙柳代表生态修复、驯鹿象征森林文明、篝火代表民族信仰，所有意象均扎根本地现实，具备明确的现实指向。其三，叙事保持客观克制，面对沙化、狩猎文明消亡、母语流失等现实困境，不刻意渲染悲情，同步记录治沙成效、校园文化传承、线上牧业发展等正向实践，形成辩证完整的论述视角。其四，运用时空对照的叙事结构，以当下场景勾连过往记忆，今昔对比直观呈现数十年间自然环境、民族生活的变迁，强化文本的现实参照意义。

整体而言，乌琼的乡土散文突破普通地域游记的浅层写景模式，平等观照草原、森林、湿地与各类生灵，记录多民族传统生产、民俗、信仰，将呼伦贝尔定义为各族群众共同的精神原乡，无论牧民、山林使鹿人还是记录者自身，都在这片土地上寻找精神归属，始终传递着对地域文化与人文精神的守护意识。（作者系内蒙古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短评